

思想史上的 失踪者

朱学勤 著

思想者文库

花城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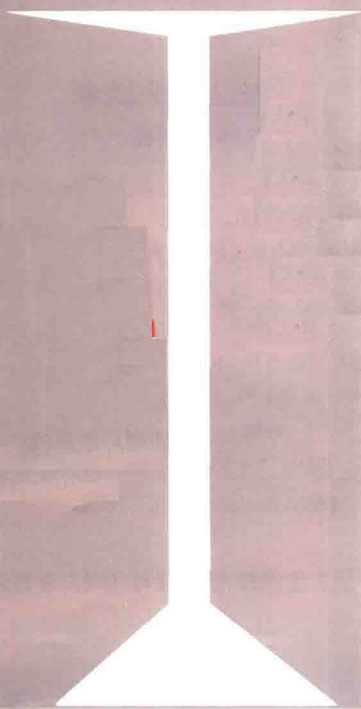
思想史上的 失踪者

44.6
ZXQ

朱学勤 著

思想者文库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朱学勤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 1999
(思想者文库)

ISBN 7-5360-3085-1

I.思… II.朱… III.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9021 号

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朱学勤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25 印张 1 插页 210,000 字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ISBN 7-5360-3085-1

I·2612 定价: 13.2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编者的话

我们在策划这一部丛书的时候，向一些作者发出了一封约稿信，其中说：

“我们这部丛书回避了‘思想家’这个提法，而用‘思想者’，还不单是为了谦逊。我们不要求我们的作者如同思想史上的那些思想家一样，都有一个自成体系的原创性的思想。我们自负的是，丛书的每一位作者都在不断地思考历史和现实，传统与未来，中国与世界，社会与文化等等这些题目。他们的作品，也是在引导和启发读者思考这些题目的。编印这样一部丛书的意图，想必可以得到您的赞同吧。”

“我们从平日阅读的印象中，觉得您是一位在深思着的作者，所以冒昧相邀，如蒙俯允，不胜荣幸。”

“我们想每册字数二十万至二十五万，基本上从已发表的作品中选录，最好是发表之后在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者。不论是否已编入文集，均可选录。只要围绕着‘思想者’这根主轴，论文、笔记、随笔、杂文均可入选。倘有未发表过的合适的新作亦可编入，但不作为一项要求。”

这丛书的编辑意图和编辑办法就是这些。

每一个人的思想都应该是独特的，既然号称思想者，就不会与别人雷同。丛书的每一位作者，他思考的范围、题目，他思想的倾向，都各各不同。因此，每一位作者只对他自己的这一本书负责，不对丛书中其他作者的书负责。每人发表的都是自己的意见，并不表示这些意见全是编者和出版社赞同的。

第一批推出六种。假如读书界愿意接受这丛书，我们想接着再编印若干种。我们看见，在这世纪之交，在思考着这些题目的，并不是只有少数人。

朱正 秦颖

1999年3月18日

序 言

这本集子由十五篇文章组成，除最后一篇外，都是发表过的文字。已经读过这些文字的朋友，可以放下这本集子，不必买了。

对于另一些朋友，比如说，想追踪自由主义学理经过五十年沉默为什么会在这一代人中重新开始？思想史的这一环节如何在自我淘洗中缓慢沉淀？这本小书或许能提供一个较为连贯的线索。

我们这一代人走得很慢，半生已过，只有两步。文革时期朦胧向往法国革命式的激进思潮，改革时期重新发现并逐步走上英美自由主义，八十年代最后一年创痛巨深，终于绷断了这两个阶段的最后一点衔接。起步晚，走得又不快，更兼分化剧烈，走着走着，很多人已经不见了，下一代人当然有理由嘲笑我们，我自己也只能把这本小书命名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第一阶段拖得太长，几乎占去了从十五岁到三十岁最好的年月。我的同代人现在很热闹地回顾插队生涯，几乎快说成又一个“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不要说听众，我自己都已经听烦。当初离城，有一种找地方去读书的冲动，后来侥幸以同等学力考进研究生，一进去，就感到与那个学术体制格格不入。十三年后重回上海，越来越不能忍受“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这样的官定名称。当时那样命名，无奈于命名权独在一方，今天再延续这样的说法，则有继续合拍之嫌。我自己想称其为“离城出走”，哪怕是出走了十三年，回来后继续在城市的边缘游走。我曾在“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中，描述过这一出走事件留下的怀念和遗憾：

自从离开那个黄土弥漫的省份，最后还值得怀念的也就是他了。十多年前我们有过一次长谈，分手在灰暗的铁路铁轨边。他有过那样辉煌的思想经历，在当时的思想棋局中，可算得业余八段。他怎么会摆弄起灯谜，而且是大陆惟一的职业谜手？曾经沧海难为水，他能放弃那种思想棋手的颠簸生涯吗？这也是一个谜，而且是更大的谜。

这个“他”是我一个朋友，现在还活在中原省份一个闭塞的小城。我只能让“他”匿名出现，一是希望能将“这一个”泛化为“那一代”，唤起同代人的共同记忆；二是留下一个小小的空缺，看看一部分学院派朋友如何反应。果然，我的一些朋友看到这些文字又惊呼起来，说这样的“他”是我“杜撰”，是一种“浪漫的炒作”。这些人也算是朋友，我称他们为“数树叶者”，要对这些习惯于计算树叶数量的朋友说清楚树底下还有多少根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不仅是因为树叶比树根纤细，数量上占据优势，还因为树叶总有阳光，散亮明媚，而树根却只配在地下的黑暗潮湿中虬曲蜿蜒；还因为“数树叶者”总是和树叶共享学院里的阳光，凡是没有发表为“文本”者，都不算，也不看。到目前为止，有“话语权者”似乎在意识形态话语之外开创了第二话语，但是这个第二话语在遮蔽另类语言的功能上却是与第一话语共通的：一旦话语扫描不到某些对象，那些人和事则继续只能算孤魂野鬼状，在权力体系的两边游荡。

思想历程的第二步，是在怀念那些孤魂野鬼的同时，重新上路。第一个引我前行者是已故思想家顾准，那是隧道里的一盏孤灯，一灯如豆。第二个是海峡彼岸的殷海光，同样是已经过世的人物，说过时也可以。至于现在谈得热火朝天的海耶克、伯林，当然是构成可贵的思想养料，从学理深度上说甚至更重要，但就内在生命的感应而言，他们总不及顾准和殷海光来得亲切。如果实

在要拉上一个在“文本”上够得上重量的人物，只能是一个更为过时的人物——十九世纪的赫尔岑。一部回忆录创造了一种流亡语体，足以弥补历史上所有流亡者加在一起的孤怀遗恨。而在当时，他却是一个沾染了一身旧贵族习气的十二月党人后裔，居然有傲气蔑称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德国流亡者为“硫磺帮”。那一年之后，我曾两次长读《往事与随想》，它帮助我克服了上述精神创痛。至于是流亡在外，还是流亡在内，倒显得并不那样重要了。

十年里，一个精神危机克服，又一个精神挑战就乘虚而入。就在写下这篇序言的前一晚，我与一个朋友写信：

北约轰炸南联盟，这边知识界和大学生普遍咒骂，感情激烈。眼见他们在反对西方国家某些政府行为时，连原来的民主、自由价值观也随之抛弃，不禁联想起五四初期大陆知识界受巴黎和会刺激，在正当表示对强权外交抗议的同时，突然弃英美亲苏俄，由此发生本世纪知识分子的第一次大规模左倾运动。第二次是四十年代中期，因受社会不公之刺激，又一次倒向左倾思潮。那两次大规模左倾造成的祸害，一次祸起于外，一次祸起于内，历历在目，至今还没有摆脱。想不到我自己活着时，还要看到一次。前年起，我对此有预感，但到今年溃瘍面如此扩大，却还是有些意外。我学的是历史，但最怕看的也是历史，尤其怕看现实中重逢历史。不幸还是看到历史锋利的刀刃，不声不响地暗中逼近。

你那里是否有赫尔岑《往事与随想》？可以读读。在理念上，我与赫尔岑的革命民主主义渐行渐远，但在感情上，尤其对历史幽暗的恐惧，却越来越感亲近。我曾说，人们只抱怨政治的残酷，却没有想过在政治残酷的底下，是历史的幽暗。

隔天接回函，又写了一段：

来信收悉，有些话是我上封信中来不及说的，而你说的又比我准

确。比如，你说“美国没有理由因为它的制度凝结了一些我们的理想，就裹胁我们必须认同它的外交霸权行为”，就很到位。

你说“把美国的制度和它所代表的民主、自由理想区别开来是有必要的”，我上次就想说这一句。这一点至关重要。这里如能改成“政府行为”，是否更好一点？我对美国的这个政府行为很不看好。弹劾案进行时，我其实很盼望看到克林顿下台。冷战结束后，居然是克林顿执政，实在是世界之大不幸。我看不出这个人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局势有像样的估计。

左派和右派都可能在这一问题上犯错误。左派的错误是因为此前把民主理想拴在美国的制度、甚至美国的政府行为上，一旦发现他们也有具体的国家利益，于是大失所望，掉头而去。大陆知识界两次发生大规模左倾化，都与这一认知模式有关。右派容易犯的错误，也是把他们的民主理想全部拴死在美国政府行为上，只是跟着这架莽撞的战车跑，不能保持独立思考。一个自由主义者在今天，完全可以在坚持既定价值的同时，理直气壮地与西方政府的外交决策拉开距离。在自由主义历史上，罗素因为反对英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被英国政府逮捕入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从历史这头说，我对美国政府的外交能力始终不抱乐观。中国内战是我们这一代亲受其害的经历，它甚至不是毛泽东的对手。跟这个国家的历史一样，太年轻，再加一点志得意满。我两次去美国，私下有一个问题：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崩溃，是因为美国和平演变战略的成功，还是苏东自己的内部变化？我的初步感觉，似乎不是前者，而是后者。换句话说，美国是意外地拣了一个便宜。但他们却认为是自己的成功，冷战结束后毫无像样的检讨。历史给了美国十年，却看不到他们有全盘的世界局势考量。历史是没有理性的。到目前为止，对美国挑战的先后出现两种力量，二战前的日本、德国，二战后的苏俄，由这样的力量挑战美国，而且又都失败，实在是美国的不幸。一个国家的外交能力是有一半是由他的对手决定的，甚至是由被他击败的对手决定的。我对美国的社会和普通民众抱有好奇，但也不是没有忧虑。1996年在哈佛，我曾经与李慎之先生谈到这一问题，他谈到美国的领导地位和内在忧虑，说了一句话，至今印象深刻，他担心美国出现中心空洞化，那将对世界历史

造成灾难性影响。我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西方思想历史，有时能强调这一点：自由对专制的对峙，历史上有两次，一次是雅典对峙斯巴达、马其顿，一次是美国对峙苏联，古代世界那一次是以自由失败告终，现代世界这一次是以自由侥幸险胜暂告段落。自由并不是必然胜利的，从几率上说，它的失败可能比对方更大。我的历史观总有挥之不去的悲观成分，与这一点密切相关。人这样的生物，能不能始终守得住自由？太难了，近乎对神的要求，我不敢乐观。

你说你有点左，其实我上次在那里以及你上次来上海就有感觉。我想我能理解这一点。1989年冬天我在电视上看着苏联降旗，百感交集，甚至黯然神伤。此前我预料这一制度会崩溃，但一旦看到苏联降旗，却又感到撕裂了我内心一块柔软的联系。我甚至与这里的一个朋友说过：“我之所以在与新左派论争时狠不下心说厉害话，是因为我年青时也左过，难道只许我自己年青时左，不允许别人在年青时也左一次？”一战时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刚上台，他的儿子就在街头参加左倾政治活动，有记者问，“如何看待你自己年青时的‘左’，以及你儿子现在的‘左’？”克里蒙梭从容对答，出语惊人：“一个人年青时不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心灵有病；一个人到中年时还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头脑有病！”这句话落地已经有一个世纪了，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在这一问题上有比克里蒙梭更好的说法。

一个一开始就是从右起步的人，我可能佩服他，但很难与他交朋友。不同的是，60年代你们向往我们，你在台大因为读这里的红宝书而被国民党迫害，我们却在突围，向往你们，打听你们在想些什么，历史开了一个多大的玩笑？民主架构初步建成与否，对生活在那一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内心忧虑向那一个方向倾斜，是有巨大影响的。我比较担心的是，由于对西方政府行为的抗议，而放松对旧体制的警惕，甚至因此而走向对后者的认同。我在美国与诸多大陆留学生交往，当然有头脑清醒者，可惜不多，大部分人或多或少都有这个问题，留下的印象大多不愉快。我曾称那是一个留学生 CHINATOWN。

这一认知陷阱，对从小受旧体制教育后来又总是被民族主义裹挟的人来说，特别有诱惑力。你曾很含蓄地表达过对大陆知识分子多半保持“中原心态”的不满，而你所抱怨的“中原心态”就和这一陷阱有关。

在内为“中原心态”，在外为留学生 CHINATOWN，其实是一回事。

是为序。

朱学勤

1999年3月31日 沪上

目 录

序 言	朱学勤 (1)
卢梭政治哲学之一：原罪与赎罪	(1)
卢梭政治哲学之二：自由之沉没	(40)
近代英美政治思潮与中国	(74)
近代欧陆政治思潮与中国	(103)
新儒家政治哲学评析：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	(132)
地狱里的思考	(151)
——读顾准思想手记	
迟到的理解	(164)
“娘希匹”和“省军级”	(171)
——文革读书记	
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184)
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	(194)
五四思潮与 80 年代、90 年代	(201)
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	(220)
“书房里的被动语态革命”与漏斗	(229)
1998 年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	(237)
两种反思、两种路径和两种知识分子	(257)
——与李辉谈知识分子	

卢梭政治哲学之一：原罪与赎罪

形而上学的种种精妙都不能动摇我对灵魂不朽和天意公道的信仰，哪怕是一时一刻的动摇。我感觉到它，我需要它，我为它祈祷，我将为它护卫至我生命的最后一息。^①

——让·雅克·卢梭

题言出自卢梭1756年8月18日致伏尔泰信，一封绝交信。卢梭本人已隐入巴黎郊外四公里处的森林隐庐。此时，城内正在上演狄德罗创作的独幕喜剧：《孤独者》。幕启处，一个状拟卢梭的滑稽小丑，跌滚出场。伏尔泰当即叫好：“卢梭吗？只不过是浑身脓疮的乡巴佬。”^②卢梭为此从森林深处发出他的抗议——一封绝交信。他以逼人的悲愤语调提醒他的同时代人，注意他与启蒙运动决裂的信仰基础，同时，也为后代读者指出他与启蒙哲学家分别进入18世纪巴黎思想界的不同入口：“我吗，先生，我是信神的！”^③

一、日内瓦的道德王国

让·雅克·卢梭，这个曾经征服巴黎的流浪者，确是“乡巴

① 转引自卡西勒：《卢梭的问题》第70页。

② 转引自布罗姆：《卢梭和道德共和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8页。

③ 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1976年版下卷，第233页。

佬”，而且是个“异邦乡巴佬”。他14岁以前的早年生涯是在一个与巴黎氛围截然不同的“道德共和国”——加尔文教的日内瓦度过的。

18世纪的日内瓦已湮没于历史。只有借助卢梭同时代人的历史记录，我们才能重新进入少年卢梭的精神家园。下面是狄德罗主编《百科全书》中“日内瓦”这一条目的主要内容，作者为——达朗贝尔。他受伏尔泰嘱托而撰写这一条目，在条目后附加建议：日内瓦当局应开禁设立文明剧院。为此曾引来卢梭滔滔十万言的长信反驳。但是，卢梭本人也承认，达朗贝尔对日内瓦政情民俗的描述是忠实的、可信的。因此，这一条目应该是现代人由此认识卢梭家园的一份较为可靠的历史文献：

日内瓦环山临水。莱芒湖长740哩，宽150哩，湖边散落着乡间民居，映衬着阿尔卑斯山峰的银色雪装。湖光山色，风光秀丽。

1534年，加尔文在该城传教成功，建立了一个廉洁教会、一所大学和一个研究院。1749年，日内瓦与法兰西缔约；1753年与撒丁那缔约，从此确保了外部平安。

这样一个城邦，人口不足24000人，散居在30个不到的村落，却拥有自己的主权，成为欧洲最富庶的城邦。

虽然城邦富足，但是她的政府却十分贫困，因为那里的税收极为低廉，每年岁入不足50万镑。

日内瓦公民分为四个层次：公民——城邦居民的男性后裔，必须生于本邦，只有他们才能进入执政机构；市民——出生于外邦的本城公民或市民的男性后裔，或经执政机构批准授予市民权力的外国人，他们可以进入日内瓦小型议会，而且可以进入被称为二百人院的大议会；外籍居民——经执政机构批准，允许居住于该城，但不拥有其他权力。最后是外籍居民在本地出生的后代，他们比父辈多享有一些特权，但不能进入政府机构。

共和国的首领是四个市政官，每人执政一年。四年后改选，不得连任。这四个市政官与一个20名地方议员组成的小型议会相联，配有一名司库，两名国务秘书，此外还有一个法院。这两个机构处理世俗性常

川事务。大议会由 250 名公民或市民组成。它裁决市民社会重大事务，颁布大赦，发行货币，选举小型议会，决定被认为应该提交它审议的议案。所有年满 25 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或被选举为大议会成员的权力。但是破产者，或被认为有污迹者除外。立法权归大议会，并决定宣战、媾和、结盟、征税和选举市政首脑。虽然投票者只有 1500 人左右，但是每逢大议会开会，总在一个大教堂内举行，而且庄严隆重。

日内瓦刑法十分苛严，比僵尸还要刻板。作为一种无益的残忍，严刑拷问在许多国家早已废止，而且也应该在所有地方都废止，但在日内瓦却合法存在。不过，它仅施予被判死罪的罪犯，如果说确有必要，也是为了发现罪犯同谋。辩护者可以要求明示罪犯所应负的责任，也可以得到他的亲属和律师在法庭上公开具文的支持。判决由市政官召集大会当众宣读。

日内瓦不承认世裔地位。首席市政官的后裔如无特殊业绩，一如普通平民般地生活。选举官员时一律平等，没有贵族或财富的等级限制。结社组党是绝对不允许的。官员无报酬，绝不可能指望以公取谋取财富。他们惟一的奢望是得到市长的嘉许，拥有一颗高贵的灵魂。

那里很少法律机构。绝大多数人和睦相处，如一群共同的朋友。即使律师、法官，也是如此。禁奢法令严格禁止使用珠宝和黄金。他们限制奢靡的消费，并要求所有的公民在街上一律步行。有一些马车，仅用于乡间。这些法令在法兰西人看来，是太苛刻、太野蛮，也太不人道了。

没有一座城市像日内瓦那样，拥有那么多幸福的家庭。在这一点上，日内瓦的道德水平领先我们 200 年。由于严禁奢靡，日内瓦人不害怕多生育子女。所以，奢靡不像在法国这样，成为人口增长的最大障碍。

日内瓦禁止演剧。他们不是不同意设立剧院，而是据说害怕演艺圈内所讲究的行头、奢华与放荡行为，在青年人中产生诱惑与混乱。那么一点麻烦，难道我们不能以法律严密督导演员行为来加以矫正吗？在这方面，日内瓦本来是可以将剧院与道德并存，同时享受这两者好处的。剧场表演能够提高公民的趣味，给予他们优雅的情趣，精妙的感觉。如果没有剧场表演的帮助，这些就很难进步。没有放荡行为，艺术也能提高，而日内瓦是能够把拉西的蒙人〔注：Lacedaemon，斯巴达人〕的庄重简朴与雅典人的都市生活方式结成一体的。至于另外一些考虑，如共

和政体的价值是如此珍重，同时也是如此开明，它也应该允许设立剧院。为了支持艺术，必须放弃那种对演艺职业的愚昧偏见，以及贬黜他们身份的种种做法。这些偏见和做法是使他们感到羞辱的主要原因，应努力驱散。为了得到公众承认，他们追求的不过是自我愉悦，而他们的社会地位却不能保障这一点。在我们中间，一个有德行的演员毫无疑问应赢得尊重，但是我们却不怎么注意他。那些凌驾于公众之上并以此寄生的包税商，那些蠕蠕而行的谄媚廷臣，尽管毫无贡献，我们却给予最大的荣耀。如果日内瓦开禁演剧，然后能以明智的规范约束演艺人，那么，这些人是可以得到保护，甚至得到尊重的。最终的结果，他们会毫无疑问地得到与其他公民相平等的社会地位，而这座城市本身也会得益，从拥有那种据说是极为稀罕然而又只能伴随我们弱点的东西中得益：那就是一个演艺剧团，一个值得尊重的剧团。让我们预言，那将是全欧洲最好的剧团。那些身怀绝技擅长演艺的人，因为害怕在我们国家中献艺受辱，将会云集日内瓦，登台献艺。那种极为优美的技能不仅不会受到羞辱，反而会赢得敬重。这座城市，由于禁止演剧而被法国人认为阴暗沉闷，不久将会成为情趣高雅的乐土，一如它现在是哲学和自由的乐土。外国人将不再惊讶地发现：在这座城市里，一个适宜的正当剧院在禁止之列，而那些与高雅趣味格格不入，一如与高尚道德格格不入的粗劣笑剧却畅通无阻。这当然还不是全部：日内瓦演员一点一滴的示范，他们行为的正当，以及由此而来他们所得到的敬重，将给其他民族的演员提供一个典范，并给那些至今还以苛刻态度对待演员的人提供一个教益。一方面，人们将不再视他们为依靠政府救助过活者；另一方面，他们历来是革出教门的对象，教士们将从此失去将他人开除教籍的惯例，我们的中产阶级也将随之放弃对他们轻蔑的看法。一个小小共和国将以此赢得改革欧洲的光荣，而这一点或许要比预想中的重要得多。

日内瓦最发达的制造业是钟表工业。它拥有5000名匠人，也就是说，日内瓦五分之一的居民从事钟表制造。其他人从事农业。农民们的精耕细作弥补了土地的贫瘠。

日内瓦的宗教，可能是哲学家最感兴趣的题目。

日内瓦的教会组织是纯粹的长老制。没有主教，甚至没有几个神父。行政官员兼任牧师，由国家而不是教会供养他们。这种行政官员必

须年满 24 岁，要经过一种非常严格的知识与品行的考核，方能担任。

地狱问题，是我们信仰中的基本问题之一，但在日内瓦许多行政官员看来，今天已不是重大问题。按照他们的看法，人若构思上帝的存在模样，是渎神行为。充分的善意和诚笃，即能对付在我们这里需要经历永恒折磨的罪孽。他们解释圣经中那些与他们观念不符的章节段落时，十分圆通，认为对那些有碍人道和理性的字眼不必过于拘泥。因此，他们相信，即使在另一种生活中有惩罚，那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不是空间问题〕。所谓赎罪之所——炼狱问题，曾引起清教与罗马教廷决裂的重大原因之一，大多数日内瓦人认为只不过是死后惩罚的问题。这是一个解决人类冲突史的全新视角。

概括起来说，许多日内瓦行政官员只不过是一个彻底的索齐尼教义信徒，拒绝所有被称为圣迹的事物，并且认为一个真正的宗教的首要教义就是增进理性，除此之外，则无它义。所以，当有人向他们宣传赎罪的必要性时——这一信条对基督教来说是基本原则，大多数日内瓦人却将这一“必要”换成“实效”——一个更柔和的字眼。在这方面，他们即使不是正统的天主教徒，至少也笃信他们自己的信条。

持这种信条的教士是应该被宽容的。但在日内瓦，教士们所有行为比能被宽容的程度还要好。他们严格限定他们的责任，首先是给公民树立服从法律的榜样。宗教法庭奠基于对公民的道德监督，仅限于精神性惩罚。在愚昧时代曾打落多少教皇之冠的教俗之争——即使在启蒙时代也引起过许多冲突，但在日内瓦确是闻所未闻。教士们只做一件事：拥护行政当局。

宗教仪式非常简朴。教堂不设偶像，不设烛台，也不设其他礼拜用品。神事只有两项：讲道和唱歌。讲道几乎全限于道德范围，而且只是为了推进道德。乐曲品位甚为粗陋，在法国人看来，恐怕是最糟糕的乐曲。不过，日内瓦只须变动两件事：一是神坛上应有一架管风琴，二是换用优雅一些的语言和乐曲。除此之外，最高存在只存在于日内瓦的适意与平静中，而不存在于我们那类教堂中。

我们在介绍那些声名赫赫的君主大国的条目中，都不曾使用过如此之长的篇幅。然而在哲学家的眼光里，这个蜜蜂般的共和国一点也不亚于那些伟大帝国的历史。它可能是这样一个惟一小国：在那里，人们能